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翦伯赞

学术思想评传

王学典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王学典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1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戴 逸主编)

ISBN 7-5013-1669-4

I. 翦… II. 王… III. 翦伯赞-学术思想-研究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4564 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书 名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Jian bozan xueshu sixiang pingzhuan

著 者 王学典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14 (千字)

版次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669-4/K·304

定价 24.00 元



翦伯赞先生
(1898-1968)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 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坠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

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作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

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 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 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

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需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 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 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 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

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的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

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现作本书代序，并加标题。

历史主义无罪

田余庆

翦伯赞教授，史学界的又一棵青松，在严寒中凋谢，已经十五年了。

我初次见到伯赞先生，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那时我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流亡到了重庆，有机会听到许多著名进步学者的学术讲演，伯赞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建国后，我对伯赞先生谈及此事，他回忆是陶行知先生邀他去讲的。他说：“你们是经过颠沛流离的学生，我很愿意同你们见面。讲历史，目的是为了抗战，为革命争取青年。至于讲了什么，已没印象，得鱼忘筌嘛！”我说只记得言外之意是骂重庆政府抗战不力，他连声道：“你是得其意而忘其言，得意忘言。”

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先生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先辈们使我深信，医生诊断不了社会的病症，而历史学家可以知古鉴今。

那时候，我对伯赞先生的突出印象，是热情奔放，文采风流。我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对他非常景仰。我佩服他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而研究历史的精神，佩服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总是结合抗日战争的需要，选定写作题目，深入浅出，说古论今。他以生动的文笔，严密的逻辑，把读者带进他的思路，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他的影响。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先生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

伯赞先生等先辈的历史著作除了以精湛的古史研究成果启迪

读者以外,更重要的是传播唯物史观,开拓历史学的新道路。伯赞先生发表于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1943年的《中国史纲》第一卷,1947年的《中国史纲》第二卷,都是极有影响的精心之作,使史学界为之鼓舞,使一代青年深受教益。伯赞先生和其他先辈们在困难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我们追念。

过去我同伯赞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印象十分深刻。

建国后,伯赞先生到了北京,我有机会较多地得到他的教诲。我听到他自豪地谈及过去在史学领域的战斗生活。他谈到在建国后的新条件下,历史科学处在新的起点,人们需要对过去的斗争有所回顾,总结得失,以迎接新的斗争,而不能完全与过去一样。那时候,有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这样做了。伯赞先生同他们一样,以科学态度对待过去,在学术界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伯赞先生说,过去,写历史文章就像制造炮弹,总想使它具有尽可能大的打击敌人的威力,总要千方百计地把历史同政治斗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此,有时候就以古喻今。当时政治压力很大,斗争很激烈,条件也很艰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也没有必要的图书资料可用。他说,那时写出的东西,现在检查起来,史料显得贫乏,有些还免不了有强加于历史的见解和不恰当的比附。他认为现在社会条件起了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因此,可以也应当对历史科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坚持斗争精神而又避免出现过去的毛病,这样才能使历史科学繁荣起来。1952年伯赞先生《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就是为此而写的。文章说:“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过去出现这些现象是情有可原的;现在史学界出现类似的现象,混淆古今,而且形成一种倾向,就值得注意

了。所以伯赞先生列举了当时所见这种倾向的许多例证，一一加以分析。

出于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心，伯赞先生很注意运用自己的经验来观察史学界的各种问题，并努力发挥自己的影响。他反复宣传，要使历史科学具有战斗力，能够不断地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首要条件是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切忌削足适履。这可以说是建国后若干年来伯赞先生评论历史研究状况时的基本主张。他在上述论文中提到、而在六十年代详加论证的“历史主义”问题，也是从这个基本主张概括出来的。

伯赞先生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讲话时，多次勉励他们说：“你们学习历史，既要学会使用显微镜，又要学会使用望远镜。前者培养过细功夫，使你们认识历史事实，洞察幽微；后者训练远大眼光，使你们纵览全局，把握要害。所以两者必须结合使用，缺一不可。”他还说，用显微镜观察，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用望远镜观察，是研究历史的向导。他后来常常使用史论结合的提法，也是显微镜、望远镜并用的意思。当然，所谓并用，有各种各样的用法。伯赞先生建国后的文章，有的偏重于阐发理论，有的偏重于探讨具体问题，不论是那一类，他都力求在文章中作到言之有物，物中见理。在我看来，伯赞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在史论结合方面，同解放前相比，达到了新的高度。1954年，他写了《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1955年，他写了《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以后还写了不少其他的历史论文。这些文章在史和论两方面都下过大功夫，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名作。

伯赞先生非常重视史料整理工作。建国之初，他参加发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并主编其中《戊戌变法》、《义和团》两种。后来，他还主持了《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的编辑工作。他有一个比较完整地汇集秦汉时期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计划，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没有落实下来。他重视工具书的编辑。他把上述

这些工作都视为历史科学的基本建设,主张大规模展开。他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写了文章,提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工作。

伯赞先生常常教育后进在科学上要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他自己心在学术,总想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多出力气,多作建树。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气氛较浓,人才培养很在成效,师生们都非常敬佩他。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理论战线出现了混乱,极左思潮开始泛滥。据我回忆,伯赞先生面对这种混乱状况,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感到不安。学校里反复兴起的学术批判,所坚持的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被混淆在一起。面对这种情况,伯赞先生疑团越来越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使他不得已于言。他顾不得开顶风船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在六十年代开头的几年里,写了几篇理论探讨的文章,主要的有《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等。他想作一次努力,试试看能否对纠正史学领域中的某些不良风气产生积极效果。

《初步意见》一文的见解,是他在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书时同执笔者讨论如何写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章经过他长期的酝酿,反复的修改。《几个问题》一文,实际上是前一篇文章的续篇。这两篇文章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极左观点而发,其中许多观点,就是北大历史系师生在教学科研中反映出来的。为了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使北大历史系的教学科研不致于离开马克思主义轨道,伯赞先生甘冒风险,据理建言。

在文化浩劫开始以前的几年中,伯赞先生对历史科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提倡、论证历史主义和探索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方面。

伯赞先生认为宣传历史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补偏救弊的迫切

需要。他所说的历史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历史主义。如果说理论战线一切正常,没有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人们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观察社会和历史问题时自然会考虑到各种必须注意的条件,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把历史主义当作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单独提出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阶级观点没有被正确运用,而是被严重歪曲,以至于使社会历史失去本来面目的时候,提出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伯赞先生作过那么多解释,我想核心之点就是要人们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质,考察历史问题时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有人问过伯赞先生:当全国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历史主义是否会引起误解。他听后沉吟不语。他也许想到了个人可能遇到的风险,但他看得更重的是科学良心。既然自己认为这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应当把自己的见解公之于世。历史主义何罪?伯赞先生绝对不会想到,他个人的灾难果真从宣传历史主义开始。

伯赞先生在民族史理论方面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有些个人的原因。他是维吾尔族人,他的家族从明初以来定居湖南桃源。他曾以自己的民族身份跟国民党进行过斗争。1943年,发表了由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断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种族和民族的差别,因此把汉族以外的中国各民族一律称为“宗族”,这样就完全否定了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存在。伯赞先生翻检翦氏族谱,写成《我的姓氏我的故乡》一文,借一支维族群体几百年的经历,批驳此书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理论。这篇寓庄于谐之作,反映伯赞先生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善于捕捉战机,而且战术巧妙。今天重读此文,还不得不对伯赞先生油然而起敬,佩服他的勇敢和智慧。

伯赞先生常常接触民族史方面的工作,看到民族史研究中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颇有感触。他主张实事求是地写民族

史。中国各民族经过千百年的交互影响，逐步结成了相似的命运，缔造了多民族国家，共同走向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历史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他认为写清楚这个曲折过程，就能够从中发现历史的辩证法，而历史的辩证法比今人的主观愿望要有力量得多。这就是民族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民族的不平等、民族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不容否认也无须回避的客观事实。在剥削阶级统治下，各族人民为此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是矛盾和斗争的结局并不是各民族你死我活，也不是各民族分道扬镳，而是共存于一个统一国家之中。这种历史进程，是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统治者都阻挡不了的。通过科学分析，写清楚这种必然的历史进程，比人为地涂抹历史以证明中国各民族从来都是和睦兄弟，不是更富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吗？伯赞先生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认为由他提出这个问题以供研究，更易为人理解。这层意思，他曾多次谈到。

我觉得，过去，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民族史问题上还没有达到过这种认识水平。从历史条件说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史问题，史学界还没有广泛地加以研究。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与此相比，伯赞先生建国后的见解，就突出地显示我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地把历史科学推向新的水平。至于伯赞先生提出过的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专门问题，例如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问题等，虽然尚未取得一致认识，但通过讨论，丰富了思想，促进了研究，也是重要的贡献。

伯赞先生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探索，引起了史学界的反响，出现了热烈的讨论。这本来是自然的事。对于学术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能求得统一的认识。但是，在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无端出现了批判所谓“让步政策”论的问题，硬说伯赞先生是宣扬

让步政策论的罪魁祸首。伯赞先生被置于不容分辩的地位，学术讨论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批判斗争。

硬说伯赞先生宣扬让步政策，并给他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等罪名，这纯粹是莫须有。因为第一，让步政策的有无，是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第二，这本来是为了探索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提出的一种浅薄见解，动机和效果都沾不上修正主义的边；第三，让步政策一词是陈伯达在延安时提出而为进步史学家所引用的，当时陈伯达还被尊为理论权威，具有假像，他被查明是反革命，是七十年代的事，这时伯赞先生已逝世了；第四，伯赞先生只是在建国初期一篇文章中偶尔提及这个词，没有专门论证过，而在《初步意见》中只是为了批评把让步政策当公式乱套才再次使用这个词。伯赞先生反对把让步政策当公式使用的观点，当年参加编写《中国史纲要》的人都多次听他讲过。伯赞先生同让步政策这种说法的关系，就只有这一点点，说他“鼓吹”让步政策，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来，所谓让步政策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批判此论也讲不出多少道理。硬给伯赞先生栽上宣扬让步政策的罪名，然后又推衍成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伯赞先生抵制极左思潮而作出的惩罚。伯赞先生竟以反马克思主义之词获谴，含恨以死，这实在是太不幸了。

伯赞先生毕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说是至死不渝。刊登在《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中的最后一篇理论文章，还在谆谆告诫大家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1963年伯赞先生在北京大学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许是一篇反映伯赞先生史学思想的盖棺论定之作。文章以伯赞先生特有的文笔，引人入胜的逻辑分析，疏导了几种不勤于学习理论的思想。他说：“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他认为学习马